

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西方形象

伍晓明

周宁的专著《天朝遥远——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》系统地研究了西方七个多世纪以来的“中国形象史”，其规模之大在汉语著作中可能罕有其匹，而其学术贡献几乎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此书并非仅限于材料的系统排列与事件的历时叙述。在此书前言的结尾处，作者表达了一个希望，一个作者在其著作中努力实现的希望，即让（中国对）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……走向理论的自觉”。的确，如果我们想从历史——此处是“中国形象”在西方的历史——中学到些什么，理论的自觉是必要的。当然，作者坦承：“这是一项艰辛的尝试，很可能落空，但却不得不开始。”为了这一可能落空却必须开始的“理论的自觉”，对于此书的讨论当然也应该从“理论”开始，尽管我们（“我们”：谁是这一集体性的“我们”？）各自心目中有关理论本身（亦即，何为理论，怎样的理论，为了什么理论，等等）的“形象”可能千差万别。因此，作为对这一“形象史”素无研究的非专家，却承蒙作者及编者诚意相邀参加笔谈，我仅想而且也仅能就该书的理论方面提一些问题，以就教于作者与读者，并即希望以此区区拙见响应并参与作者所致力之“理论的自觉”。

第一个问题：关于形象本身的理论。此应当是一项有关任何所谓“形象”的研究的出发点。我在书中第一编的引言中找到了作者为形象所下的简短定义：“‘形象’指某种掺杂着知识与想象的‘表述’（representation）或话语（discourse），‘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’。”此定义似乎略嫌语焉不详，以至于令人不无困惑。首先，是“representation”一词的翻译在这里易生误解。译为“表述”，则“述”义强而“表”义弱，于是“representation”一词之再现一“形”或“象”于心目或意识之前的本义就不见了。当然，我知道作者在此是接受了某种现成的翻译，但在定义一项研究的关键概念之时，若欲使用西方概念，那么对于译名的谨慎，尤其

是对于作者赖以建构其理论出发点和理论框架的“西方”概念的谨慎，似乎是非常必要的。其次，representation与discourse“在理论上”似乎应是各有边界而非可以轻易互换的概念，故似乎不好以一“或”字加以混淆。第三，如果真可以等“形象”于representation（再现）的话，那么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成为如何定义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本身。如果我们接受作者所引用并认同的赛义德的看法，即有关representation的真正问题在于“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”（或“再现”，下同），或者，是否任何以及所有的表述，因其是表述（representations），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，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、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（我相信如此），那么，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下面这一事实：“一种表述本质上（eo ipso）乃牵连、编织、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，唯独不与‘真理’相连—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”（强调为笔者后加），那么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研究之是否可能就成为一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很可以问，作者是否也必须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，再现（或，照作者的说法，“表述”）一个西方，一个从1250年到当代的漫长的西方，而且——让我们至少提及这一点——是一个并非仅仅具有单一面相的、必然是复数的、必然不可能与自身同一的西方？而这一再现是否也必然是某种形象的再现，或某种再现的形象？如果是这样，作者是否至少首先必须对自己对于西方形象的再现或“表述”的可能性本身进行考察？如果，照作者所接受的赛义德的极端说法，再现或“表述”不仅不与真理相连，而且“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”，那么一项理论研究，一项以揭示“西方的中国形象”之后或之下的“真相”或“真理”为目标的研究，其可能性之条件又何在？这些是我在阅读周宁的宏大专著时所首先感到的问题。但在具体转向对这些问题的简略讨论之前，我还想就周宁的形象定义的第二部分略赘数语，此即断言形象“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”（强调为笔者后加）。我知道这也是作者的引用而不是他自己的创意或发明，但此“表述”本身作为形象的定义的一部分确实令人费解。首先，这似乎不能算是关于形象的定义（即并不回答“形象是什么？”的问题），而只是对于形象的性质的某种描述。但即使是不以定义求之，这一被作者引来对于形象进行描述的语句仍然让我困惑。如果作者已经接受了形象为某种representation的看法，而representation则必然为某事物之representation或再现或“代表”的话，那么形象当然始终都只能是某种事物之再现或“代表”（representation），因而不可能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无关。形象必然始终都是某种事物之形象。至于作者在其书所欲专题讨论的形象，西方的中国形象，则当然只能是西方所见到的“中国”的“形象”。因此，一旦接受和使用“形象”这一“表述”，